

宣城县之史資料

第二輯





上图 卢烈吾遗作局部

右图 卢烈吾遗作

王朝信 摄



溪口朝天洞佛教寺庙

王朝信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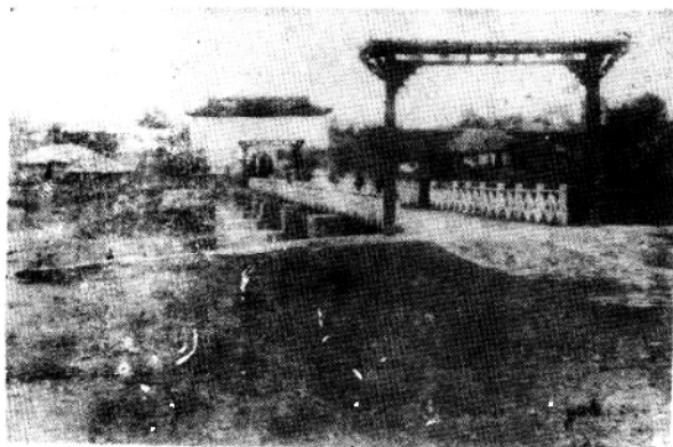
抗战前敬亭山腰之翠云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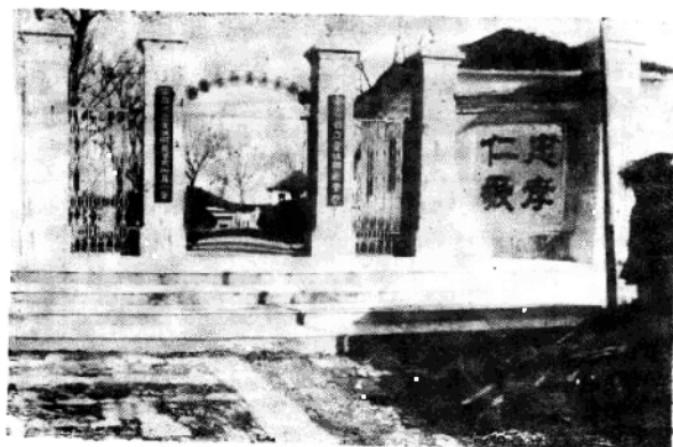
抗战前鳌峰公园内的南楼



抗战前宣城谢眺楼（即北楼）



1933年修建的凤凰桥（时为“南惠桥”）



抗战前省立宣城四中、宣城师范、宣师附小总校门

注：本书图片，除署名者外，均系宣城县志办公室供稿。

目 录

庙埠暴动	县党史办供稿(1)
回忆革命老人史泗群	陈亮(9)
叶飞将军在金南乡	陈光敬(14)
我对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的回忆	徐继光(19)
近代抗法、抗日英雄肖三发	潘云鹤(23)
忆抗日青年工作队	伍绍谷(28)
陈光虞先生二三事	陈政(31)
汪彭年先生传略	汪廷华、江式玉(35)
宣城参议会概况	沈家让、薛德厚(39)
宣城培英中学	张凤藻(43)
抗日战争前的宣师附小	胡相(59)
潘小凡先生传略	云中(62)
杨林“文化乡”史话	刘虎(66)
宣城体育经历	言襄(72)
宣城新闻通讯略谈	县委宣传部志办供稿(78)
宣城电影事业发展简况	袁传鼎(82)
卢列五先生的生平及其绘画艺术	陈解明(85)
宣笔偶谈	邹恩雨(88)
宣城十景	王锡鼎(93)

宣城历代疫病流行情况概述	树东(96)
宣城红卍字会	姚剑琴、汪廷华(99)
水东蜜枣	张世白(101)
宣城茶叶	胡承义(103)
长兴渡垦殖生产合作社始末	刘启林(111)
漫话金宝圩	金宝圩堤管会供稿(114)
宣城治水人物初考	何亚平(117)
宣城早期商业概况	蔡近塘(119)
宣城盐市	孟祥志、王锡鼎(123)
宣城侨务简述	庄长萱(127)
朝天洞的由来	翟筱峰、陈亮(131)
在日寇盘踞孙埠的日子里	刘正元(134)
日寇血洗宣城北郊记实	根据王图金口述整理(142)
反革命份子万诗吟的下场	何长松(147)
后记	编者(150)

庙 埠 暴 动

县党史办供稿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日，宣北集镇——庙埠，爆发了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暴动。暴动队伍五百余众，冲击国民党自卫团，焚毁其营房“广王殿”，在敬亭山、团山一带与敌激战一昼夜。这次暴动，在宣城人民革命史上，写下了壮烈的篇章。

(一)

庙埠在宣城北门外，距城十华里，有二百余户居民，一千多人口，东临水阳江，西傍敬亭山，是个水陆交通和商业发达的小镇。这里山环水绕，地势险要，国民党宣城县自卫团十三支队徐炳钧部驻防在中街头的“广王殿”内，县商会会长陈任亭在镇上设有“裕隆祥”分店。周围乡镇人民，既受土豪劣绅的剥削和压迫，又遭土匪和自卫团队的抢劫与掠夺，加上连年灾荒，造成粮食极度紧张。一九三〇年入春以后，“升米六百文尚无处买”城乡各地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宣城于一九二七年冬建立的党组织虽连遭破坏，但革命如芳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到一九三〇年七月，党的组织和各种群众团体，都有很大发展。由中共中央巡视员王步文于一九二九年上半帮助恢复和建立起来的中共宣城县临时委员会，这时建有五个区委，十五个支部，党团

员二百一十人，分布在县城及团山、庙埠、油扎、双桥、孙埠一带，开始活动。

团山在宣城和敬亭山的西边，离城二十里，距庙埠十多里，这一带一九二八年前后，经范离同志发动，组建的农民协会，这时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各地农民协会，彼此常有联络，互为影响；特别是邻县万春湖农民的“抗租斗争”南陵县东西乡的“抢米风潮”和广德县王金林领导的农民暴动，给宣城人民以极大鼓舞。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农民协会数百人，一次在庙埠，截击米船一只，缴获船上国民党团丁长短枪各一支，夺取大米三百二十担，初步显示了革命力量。

县城的学生运动日益高涨。县临委以省立第四中学（以下简称四中）为重点开展工作。当时党团组织没有公开，四中党团负责人是胡兴奎、万亚新、董祚楷、陈应笙，内部交通是李允功，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四中发起两次罢课游行示威，一次是反对电影院门警开枪打死一名小贩，一次是抗议“裕隆祥”店老板仗势关押四中斋夫（即工友）罗福。这两次斗争取得胜利。四中学生创办了《锄头》和《血光》两种进步刊物，《锄头》由胡信民主编，《血光》由董祚楷和万亚新主编。除四中外，女子中学，宁属中学和皖南中学都建有党团组织。在各校党团组织的外围，成立了“反帝大同盟”革命群众组织，仅四中一校就有六十余人。

一九三〇年九月，国民党安徽省省长，军阀陈调元调三十七军一个团的兵力，途经宣城进行整训，准备“围剿”广德红军，各校党团和“反帝大同盟”组织，积极开展宣传，在东西大街及宣城到双桥的公路两侧，遍贴标语、传单。主要内容是：“广德红军是反帝反封建的军队”，“广德红军是爱

国爱民的好军队”、“穷人不打穷人”“打倒新军阀”、“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十月间，各校党团组织大闹了国民党的“童子军检阅”四中团员陈从有，朱德苞，杨德润，张国祥等先后被捕，县城笼罩着恐怖气氛。万亚新因身份已经暴露，经组织决定，由陈应笙护送到庙埠一位塾师家里暂避风险，但斗争并未终止。

上级党组织多次派人抵宣巡视和指导工作。一九三〇年五月，中央巡视员在宣城作了六天工作后，对县临委的工作表示满意。并作了具体布置，强调指出，一、派党员到水东煤矿搞工运。二、把县城、水东、水阳作为三处“工作中心”。五月二十四日，芜湖市委指示县临委，“无论如何要公开的号召土地革命”，要“发展矿工组织”。七月二日，芜湖市委要求宣城党组织搞好水东工运工作。八月，芜湖市委派何冰心（后叛变）来宣城，在鳌峰和夫子庙召集党员和积极分子会议，提出：“以暴动纪念暴动”（后一个暴动指“八一”南昌起义），“组织政治总罢工”。据此，县临委决定把武装暴动作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十一月十六日，皖南特委在芜湖召集皖南各县县委书记扩大会，讨论“发动皖南农民战争”，“拥护红军”（按：“红军”指广德王金林农暴部队）等问题。皖南特委在向省委汇报情况时说：“现（宣城）正在东北乡（按：应为西北乡）集中，准备去缴进攻广德红军驻在宣城白军的械”。情况确实如此，十一月下旬，在西北乡团山、独山、庙埠、后村一带，各个农民协会异常活跃，有的已在作暴动准备。一场较大规模的武装斗争，正在张地酝酿着。

(二)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下旬，芜湖特委何冰心、张宅中、牛文三人前往广德路过宣城时，万亚新汇报了庙埠一带农运状况，他们了解到庙埠群众要求暴动，城里党组织又可以通过一个姓魏的搞到国民党自卫团的部分枪枝。便决定留下张宅中在宣城布置工作。一天，胡兴奎陪同张到双塔寺（庙埠附近）召开暴动筹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三十余人。会上，张宅中提出了暴动计划和组织安排，他指出：暴动成功就联合郎广王金林部队向芜湖进攻，到芜湖过阴历年，如果失败，就退向郎广，与王会师。暴动时间，会议确定在十二月十五日，暴动指挥部由张宅中、胡兴奎、陈应笙三人组成，张任书记，胡分工宣传，陈分工青年。会议还研究了几项具体工作：（一）派人做庙埠自卫团十三支队的策反工作，争取里应外合，悉缴其械；（二）派人做土运工作，争取一伙有二十多入枪的土匪参加暴动；（三）派陈应笙去南陵借枪；（四）派万亚新去广德联络王金林，打下水东，从水东的大郭村乘煤矿火车直达双桥，以配合庙埠暴动。

十二月初陈应笙和万亚新分头出发，其他准备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暴动指挥部设在庙埠镇外约二、三里的一个山岗上。这里松林茂密，绿荫丛中有一幢汤老四的空屋，十分隐蔽。

十二月八日前后，一批批农协会员纷纷提前赶来集中。郑前裘、葛家才、黄克卓等率领两百多人从团山而来，蓝天青率一部分人从养贤乡而来，后公庭、后正海叔侄率一部分人从后村而来……，后公庭原为四中工友，地下党员，这次

暴动分工伙食供应工作。郑前裘是江南汽车公司驾驶员，八日在团山附近故意把装运军火的汽车开歪，预先埋伏的农协会员乘机夺取了车上的十几枝枪和部分子弹、九日晚经联系参加暴动的十几名土匪也携枪前来，指挥部已集结到五百余人，虽只有少数人持枪，大多数以土枪、刀矛、棍棒为武器，但群情激奋，士气高昂。部分群众纷纷急切要求提前暴动。这时指挥部因获悉敌人已察觉暴动意图，就决定提前行动。指挥部立即把五百多人分成五个赤色先锋队，任务是：有的破路（破坏独山附近芜——宣公路桥），有的破坏电话线，有的占领独山汽车站，主要力量用于攻打“广王殿”国民党自卫团十三支队。

十日凌晨三时，暴动开始！敌十三支队徐炳钧部似有防备，当其两名团丁在大门口被击倒，余众即从后门窜进山林，暴动队伍遂占“广王殿”，缴获三枝步枪和部分弹药，并将广王殿付之一炬。这时，指挥部因组织工作不够健全，队伍分散指挥莫及，内中十几名土匪乘机擅自打开了商会会长陈任亭的“裕隆祥”杂货分店，部分队员也随之涌入，在混乱中“裕隆祥”分店起火，“广王殿”和“裕隆祥”两处大火，熊熊相映，国民党县长段永新闻讯，急调特务队长周云龙“率队驰援”。潜逃的十三支队与之呼应，持枪的暴动队员鸣枪还击，一时枪声大作。黎明，暴动队伍，因多数人无枪，又因指挥混乱，竟跑散了大部分人。总指挥张宅中因无法指挥而脱逃，胡兴奎，黄克卓等带领党团骨干百余人沿着敬亭山麓向芜湖方向且战且退。

十日清晨，暴动队伍退经麒麟乡，迅即打垮麒麟团后备队，击伤团丁两名，缴枪两枝。上午八时，到达岗林，冲进

竹棵土豪陈宝祥家，搜缴来福枪五枝，子弹一箱，并烧毁其田契。中午，十三支队尾追而来，胡兴奎等抢占竹棵土山，敌仗火力优势步步逼近，暴动队员猛扑下山，迫敌逃窜，并击毙团丁两名，缴其步枪两枝。午后，驻团山的自卫团二支队，湾沚的防队，县城特务队等反动武装沿芜——宣公路聚集而至，向踞守土山的暴动队员疯狂射击，邵世坤等数人中弹牺牲，另有十余人负伤。战至傍晚，暴动队员在弹尽无援的情况下，向西北方向散去，暴动至此失败。

(三)

庙埠暴动提前举行，县城党团组织没有及时得到通知。待听到激烈枪声，又见庙埠火起，各校党团和“反帝大同盟”的热血青年才开始行动。他们原定的任务是舆论宣传，扰乱和牵制敌人。这就是散发事先在庙埠赶印的标语、传单、宣言。因敌人已倾巢出动，所以散发宣传品的学生很多被捕。如在高坝街头上被捕的就有宁中学生胡健、张中一、杨久三和一个姓魏的共四人。

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当局更加凶狠毒辣，对暴动队员进行残酷迫害。十日下午，在竹棵因伤被俘的十余人全被杀害。葛家才的弟弟葛家发，因貌似其兄，无辜被杀。而葛家才在团山被害后，国民党新丰乡乡团长赵学伦竟强迫黄克卓和方炳南抬着葛的人头到县城示众。后村后公俊，因其侄后正海参加暴动而遭受毒刑。暴动队员被捕者数十人，除胡兴奎、黄克卓等少数人被押送安庆监狱外，大多数人惨遭杀害。

一九三〇年底到次年初，中共宣城县临委遭到严重破坏。县委书记史泗群隐蔽到寿州。团山、庙埠一带党的基

层组织和农民协会悉遭破坏。学校党团组织破坏也很严重。四中反动校长胡家健，多次带领军警特务，逮捕进步学生。该校共有学生五百余人，这年寒假，除被捕被杀者外，被校方以“个别通知”开除学籍的就有一百零八人。全县一片白色恐怖，革命斗争转入低潮。

(四)

府埠暴动失败的客观原因是敌强我弱，力量悬殊、一九三〇年下半年，宣城革命形势虽然发展很快，但暴动条件并未成熟。当时在县城的敌人约有三个团的武装（包括陈调元的部队），而暴动队伍只有五百余人，既未经过严格训练，又未掌握一定数量的武器。在这种形势下在县城附近发起暴动，是难以取胜的。

主观原因是受“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和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具体表现在：（一）没有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芜湖特委多次派何冰心、张宅中等人来宣，要求宣城党组织立即组织暴动，但在暴动时却没有充分发挥县临委的组织领导作用和党团员的骨干作用。特委和指挥部对大暴动后如何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造成武装割据局面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没有认真研究。这是暴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没有周密的计划安排。指挥部原打算与王金林部队相配合，但未联系落实好就行动起来，暴动时间提前，又没有及时通知城里党团组织，这样就造成了关键时刻孤立无援的被动局面。（三）没有做好思想和纪律教育工作。暴动队伍五百余人，由于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在攻打“广玉殿”后，就各行其事，火烧“裕隆祥”时出现严重混乱，后

在战斗紧张时大部分人却跑散了。指挥部忽视思想教育，没有严明纪律，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四）没有重视水东煤矿的工运工作。当年水东煤矿有工人三千多人，生活困苦，“每天工时在十八点左右”。一九三〇年五月以后，中央巡视员和芜湖市委多次明确指示宣城县党组织派人去做工运工作，但一直没落实。暴动指挥部没有发动水东矿工作为一支强大生力军参加统一行动，确实是重大失策。

庙埠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业绩是不可磨灭的。这次暴动震动了敌人，打击了反动势力，揭开了我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对国民党新军阀英勇斗争的序幕。是我县人民用革命的武装去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它播下了革命火种，留下了深远影响，为我县人民革命斗争，特别是抗日时期宣北、宣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教训。

在庙埠暴动中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本文系县党史办送审稿，章永林同志整理）

回 忆 革 命 老 人 史 泗 群

陈 光

一九五三年秋天，当时我在县委统战部工作。一天，组织上把寻找史泗群的任务交给了我，于是，我从西乡而北乡，辗转两日，走一处，访一处，终于在过庙埠八华里的丁冲找到了史泗群。当地一位农民指着塘边手持钓竿两鬓斑白，年近花甲的老人说：他就是“三老爷”史泗群。乍听农民称之为“三老爷”颇觉刺耳，但为了完成寻找任务，不得不前去问讯，见面后，老人态度和蔼，性格开朗。将我引至别具一格的茅屋吊楼里坐定，吩咐老伴做午餐，我俩边吃边谈，从此相识。一九五五年他是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县政协副主席，驻会办公，几年来朝夕相处，与我谈古论今，有时谈家史，谈艰难的革命岁月，谈个人的经历坎坷和不幸遭遇，他虽年长我三十余岁，但从不以革命长者自居，故而由工作关系，逐渐形成了忘年交。一九五八年我被错划右派，老人给我思想上帮助，生活上支援，至今记忆犹新。十年动乱，尤其是宣城武斗剧烈期间，老人害怕遭殃，在我宿舍里躲避两月，终日看书，和我谈天，不出家门一步，一九七一年，老人已近八十高龄，一天上街卖食品，被一农民柴禾担子撞倒，那农民慌忙将其拉起，老人笑笑说：“没事，你可怜，即使跌伤了，我也不会找你”。后因坐骨折断，卧床一年余，不幸，于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三日在宣城城关病逝，终年八十五岁。

据我所知，史泗群老人是宣城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也是较早的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又是解放后，省文史馆成立初的馆员之一。

史泗群原籍合肥桥头集人，出生于天津清军幕府，在那里度过了童少年时代，因其祖辈在宣、泾两地，置有田房产业，故宣城是他第二故乡，其父史筱斋与清军总督聂士成是姻亲关系，得以提携为清军高级官员，专驻天津训练清军多年，曾任过驻俄使馆外交官，其兄人称“史大老爷”是北洋政府段祺瑞的参议员，安福系的“四大金刚”之一（中坚分子）。

史老青年时代，就读于安徽高等农校，曾到内蒙河套垦区搞过测绘员。一九一一年到广州参加过辛亥革命敢死队。任过安徽屯溪警察局长，由于他公正清廉，好仗义打抱不平、任职时间不长，反动当局不容，遂卸职离任。临行时商民夹道欢送，并赠以“史青天”的软匾，官场失意后，便跑到北京，拟向其兄索银元三千，回宣城筹办试验农场，殊不知其兄宁花巨金买一满族妓女为妾，不肯与之办农场，故而弟兄反目，面对腐朽社会，官僚没落家庭，愤愤不满，一气之下为争取解放，寻求真理，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

一九二四年左右，史老在芜湖萃文中学，经进步教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他与祖晨同志（革命烈士）在宣城组织过“外交后援会”，设立油盐、水阳检查组，专门检查抵制日货，曾发动群众把伪县长绑架游街。

一九二七年受党的派遣，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贺龙同志率领的起义军中负责后勤工作，后因患眼疾，双目